

雙程路

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

盧瑋鑾 熊志琴

古兆申訪談錄

OXFORD



從一個人的發展路線圖看，我察悟的不是「一個人」的故事——更不宜把它看成標榜個人的成果。而是體認出香港這塊土地，長久以來，無意間培育了人的內心自由。……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如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眾多文化人訪談中，這種隨個人理念發展的文化氣氛，十分顯明，令香港文化路線頗為駁雜。正因如此，幾乎人人有幅自己的路線圖，有的從一而終，有的變化多端，拼圖識世態，十分可觀。

古兆申的路線圖，顯示了他的思路曲折多變卻又從一而終。這樣說並沒有矛盾。四十多年來，他以敏感思維，就即內心自由遊走於各種文化理念中，不斷的尋路，不斷的反思，不避自我調整。雙程路，有來有往，有東有西，各種文化差異，要汲取，要認同，面對審美、政治、文化的殊異，未免有激動、喜悅、徬徨。經過幾十年的奔波，無數衝擊，曲折路上一再考量，他終於回歸中國的雅文化。這其實是他的一貫性向，調適了青中年時候的一切乍驚乍喜的翻騰，回環曲折後，遂重投純化的中國雅文化中。

我相信有心的讀者會在本書裏，看出古兆申思想的多元而複雜變化，同時，又對中國文化之情的不離不棄。在香港，這塊「奇異」的地方，作為多作反省的知識份子，大概都有似曾相識的認同。

——盧瑋鑾(小思)

談到久矣不見的老朋友古蒼梧，自不然勾起對這位溫文儒雅卻又嫉惡如仇的詩人、崑曲愛好及推廣者的懷念之情。古蒼梧的作品非但引古證今，說理證明，還洞徹玄微，勾勒要旨，以說其亦不勝嚮往，且也足以體認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關懷。

——戴天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395893-7



9 780193 958937

雙程路

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

古兆申訪談錄

訪談：盧瑋鑾

熊志琴

記錄：熊志琴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rst published 2010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雙程路

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

古兆申訪談錄

盧瑋鑾、熊志琴訪問

熊志琴記錄

ISBN 978-0-19-395893-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本書出版蒙利希慎基金支持，謹此致謝

前言

雙程路怎樣走？

盧瑋鑒

自2002年開始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我遂展開了一段不可回頭的長路——或深或淺，或多或少地進入許多香港文化人的人生旅途，讓我更理解身處香港這個「奇異」空間的知識份子，如何艱難尋路，盡一己之力，發聲發熱。

古兆申長達三天的訪談，顯示了跨越香港，遠觸歐美，回顧海峽兩岸的不同視野，怎樣磨煉一個香港文化人的心神，從多元而多變的抉擇中，信念始終不移，堅定走了曲折的道路。

六十年代就認識了青年的古兆申。儘管熟，合作機會也不少，仍對他有太多不理解。只覺時代不同，他思想變化也多樣。例如對於他由美國回來前後的意識型態轉變，長生活於香港的我，實在無法理解。他在《盤古》的態度變化，我有點跟踪不上。他和溫健騮辦《文學與美術》、《文美》，走的路，許多我不能認同。他去巴黎，我取笑他是另類浪漫主義。八十年代，與戴天、黃繼持、鄭樹森等好友，辦《八方》，正不遲不早接上內地開窗迎風的時代，做好文化交流、中介平台的本份。在台灣解嚴後，他為台灣編《漢聲》，到內地採風取料，我說兩岸溝通，就靠你們搞民俗藝術先行了。過一陣子，他又一頭栽進茶文化、崑曲中，入迷得一生一世，使我這個只在外圍閒蕩的人，難以妥貼接近。但通過

這次訪談，大概可以整理出一幅讓人了解的古氏路線圖來。

從一個人的發展路線圖看，我察悟的不是「一個人」的故事——更不宜把它看成標榜個人的成果。而是體認出香港這塊土地，長久以來，無意間培育了人的內心自由。「內心自由」一詞，我是從殷海光先生的〈自由的倫理基礎〉一文中借來。殷先生講自由的理論太豐富，我只借用或該說截取其中一小段：「內心自由，我叫做開放心靈的自由，同意於心靈不作囚徒的自由……一個人想要他的身體不作囚徒淺而易行，想要他的心靈不作囚徒則非有超越他的時代和環境的才識及訓練不可，……一定得做許多聰明的反思。」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如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眾多文化人訪談中，這種隨個人理念發展的文化氣氛，十分顯明，令香港文化路線頗為駁雜。正因如此，幾乎人人有幅自己的路線圖，有的從一而終，有的變化多端，拼圖識世態，十分可觀。

古兆申的路線圖，顯示了他的思路曲折多變卻又從一而終。這樣說並沒有矛盾。四十多年來，他以敏感思維，就即內心自由遊走於各種文化理念中，不懈的尋路，不斷的反思，不避自我調整。雙程路，有來有往，有東有西，各種文化差異，要汲取，要認同，面對審美、政治、文化的殊異，未免有激動、喜悅、徬徨。經過幾十年的奔波，無數衝擊，曲折路上一再考量，他終於回歸中國的雅文化。這其實是他的一貫性向，調適了青中年時候的一切乍驚乍喜的翻騰，回環曲折後，遂重投純化的中國雅文化中。我相信有心的讀者會在本書

裏，看出古兆申思想的多元而複雜變化，同時，又對中國文化之情的不離不棄。在香港，這塊「奇異」的地方，作為多作反省的知識份子，大概都有似曾相識的認同。

由於把十六萬字的訪談文字稿加以撮錄，章節間容或偶有重疊跳接的部份，細意讀來，問題不大。此書特別處，註釋文字較多，為的是以核實詳註來補充口述時的史料不足，有了這些註釋，這雙程路，也非古兆申一個人的故事了，善讀者自會在當中尋出更多路線圖，我想古兆申不會介意的。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六日

代序

現代中國文化人的終極關懷

戴天

魯迅的「人」

小思在電話中談到久矣不見的老朋友古蒼梧，自不然勾起對這位溫文儒雅卻又嫉惡如仇的詩人、崑曲愛好及推廣者的懷念之情。放下電話後，旋即找出蒼梧的作品來讀，及至看完那篇〈載道與言志〉¹，則發現非但引古證今、說理證明，還洞徹玄微、勾勒要旨，以說其亦不勝嚮往，且也足以體認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關懷。

如說魯迅，認為其憂思，「不僅針對中國人的『魂靈』，而且兼及世人的『精神』」。他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於初步接觸西方現代文化之後，即有如此感慨：『蓋唯物之傾向，固以現實為權輿……故在十九世紀，愛為大潮……不知縱令物質文明，即現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傾向偏趨，外此諸端，悉棄置而不顧，則按其究竟，必將緣偏頗之惡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終以滅亡，歷世精神，不百年而具盡矣。』（〈文化偏至論〉）是故，其文旋即指出：「魯

1 古蒼梧：〈魯迅·朱光潛·陳映真的終極關懷〉（代序）。黃繼持：《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vii-xviii。

迅對資本主義崇物縱欲的憂思，可說是超前的。他擔心物欲無限膨脹，必導致對精神生活的戕害。」

又說：「魯迅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肯定，當然包括進化、科學、自由、民主、平等諸觀念。但他對這些觀念或理論的肯定，並不是沒有條件的。其前提是對『人』的尊重。魯迅極想提倡的即以人為本的個人主義。魯迅在世紀之交，看到十九世紀西方文明之弊，乃寄望二十世紀個人主義思想得以倡導，而人的尊嚴被充分重視，以此為『世紀之新精神』。百年轉眼已過，魯迅所倡導的新精神，並沒有得到重視。在二十世紀中，人的尊嚴，在鼓吹平等的蘇式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鼓吹自由、民主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及其營壘中的第三世界國家，亦備受踐踏。其中關鍵，魯迅早已預見，他引德人欺契納爾 (M. Stimer) 云：『真之進步，在於己之足下。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個人，亦即資財，亦即權利。故苟有外力來被，則無問出於寡人，或出於眾庶，皆專制也。』（〈文化偏至論〉）據此，〈載道與言志〉文中說：「無論是『寡人』的『平等』式專制，或是『眾庶』的『民主』式專制，對個人尊嚴都產生了致命的戕害。整個二十世紀歷史，在在都印證了魯迅的論斷。」

旨哉斯言！而文章在重申魯迅視立人為根本，而立人有賴於文藝的觀點，以及其個人的取捨後，指出「魯迅晚年思想左傾……並沒有改變他早期重視『人』與強調個人獨立思考彌足珍貴的初衷。正是由於他堅持而受到左翼文藝同人一些教條主義者的攻擊與圍剿，魯迅一直不妥協地堅持他的『立人』思

想，直至生命結束」。這一點，恐怕是許多魯迅的研究者，或未曾或不敢指明的。

· 朱光潛的「人」

有別於拿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雞毛當令箭之輩，又或以馬恩列斯所謂「科學真理」虎皮當大旗而肆意批判乃至打殺之流，古蒼梧對動輒在「新中國」被當成箭靶的美學家朱光潛，也有不同於一般的認識。

且不說毛澤東通篇拾人牙慧（主要拾的是馬列所謂階級鬥爭及人性論觀點）的《講話》，即使是所謂「科學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原典，由於某些人的一知半解或有意扭曲，其實也卑之並無高論。而說來說去，也不管徵引了多少片面的資料與文獻；將哪些作家與藝術家列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或所謂革命無產階級藝術，並視之為上品（同時把那些不合其繩尺的作家與藝術家或貶斥或排斥）；最後則必然歸結到列寧的文學藝術黨性原則！據此而對朱光潛說三道四，其虛妄不問可知。

那麼請看古蒼梧怎麼說：「美學家朱光潛晚年的思想，雖對其早期思想有某方面的回歸。然此一時期對青年馬克思人文思想的研究，卻是一個格局大開的新發展。晚年朱光潛所關心的也是『人』的問題。他晚年所以對青年馬克思《經濟—哲學手稿》大力鑽研，是因為他發現其中所反映的人文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家及道家的人文思想有可接軌之處。《手稿》認為私有制帶來『異化的勞動』，使人喪失『人性』——也就是與其動物性有別的『社會性』。異化勞動的徹底廢除，乃共產主義的

前提。『自我異化的私有制的徹底廢除』，使人『真正佔有人的本質……回到一種社會性（即人性的）人的地位』。而共產主義是一種『完善化的（完全發展的）自然主義』，而這也就是『人道主義』。倒過來，『完善化的人道主義，也等於自然主義』。自然之中有人，人之中有自然。經過人在長時期中憑勞動實踐對自然的加工改造，自然變成了人化的自然；而人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也不斷改造自己，藉自然而豐富了自己。」

而也「正是在『盡性』這一點上，朱光潛把儒家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接上了軌。至於如何『盡性』，朱光潛就詩、禮、樂所起的作用，加以申論：『儒家教育特重詩，以為它可以興觀群怨；又特重禮樂，以為禮以制其宜，樂以導其和。《論語》有一段話總述儒家教育宗旨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禮、樂三項可說都屬於美感教育……蘊於其中的是性情，受詩與樂的陶冶而達到和諧；發於外的是行為儀表，受禮的調節而進到秩序，內具和諧而外具秩序的生活，從倫理觀點看，是最善的；從美感觀點看，也是最美的。』」

說儒家與早期馬克思理想接了軌，容或有可議之處。但朱光潛指出「儒家認定美育為德育的必由之徑」，則誠如黃繼持所說：「在現代思維照明下，煥然一新」了！

穿越古今之智

與包括蔡儀、李澤厚與洪毅然等在內，形形色色的朱光潛批評或批判者截然不同的，古蒼梧竟將朱光潛與解放之

後，自毛澤東以降，儼然奉為神明一般的魯迅相提並論，還認為在思想上彼此有相通之處，而且同樣將兩者的有關表現，歸納為關心「人」的問題。

古蒼梧之所以這樣說，並非無根高蹈之談，也非好為攀比之論，而有其鞭辟入裏兼且自由獨立的理據。比如，對朱光潛所指出的「儒家認定美育為德育的必由之徑」，並認為「德育從根本做起，必須怡情養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養性，所以是德育的基本功夫」，即賦儒家美學思想以現代意義的申論，古蒼梧便說「未免是一種『抽象繼承』，即用儒家的哲學語言，來闡釋自己的思想。這種論述，並沒有考慮到儒家肯定禮樂的具體背景，也沒有深究儒家對先王制禮作樂原因的理解……。」

據此，古蒼梧就引用儒家原典，有所疏理，亦可謂對朱光潛的不足或不周延處，作了補充。比如，他說：儒家對於人類欲望擴張，有一危機感。《禮記·樂記》有下面一段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是則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若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亦據此，古蒼梧指出：「這確是儒家對人性一種透闢的觀察，代表了中國人早熟的智慧。這與兩千多年後魯迅對物欲擴張的憂慮，遙相呼應。變化性情，節制人欲，就是儒家所理解的制禮作樂的原因。」但「儒家提出制禮作樂以為人欲之節，雖有很好的前提，也有華麗的包

裝，就其實質而言，卻是不合理的。儒家的制禮作樂，從『等差』的倫理觀出發，其目的雖謂『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禁暴舉賢』，實際的情況卻是：禮樂按等差而立，禮儀制度本身即等差的體現。《禮記》對周禮詳盡而具體的記述，固說明了這一點，由先秦迄清的中國歷史，更生動地反映了禮樂所節制的，其實只是大多數百姓的欲望。至於在上位者，則按其等級做不同程度的縱欲，王帝更可達到荒淫無度的境況。正是這樣一種禮樂制度，支持了傳統中國社會不合理的生產關係，促成了『異化』的勞動與人的『異化』……。」

但儘管如此，古蒼梧仍認為朱光潛「儒家認定美育為德育的必由之徑」之說，「是重要的」，並指出以文藝變化人的性情，轉化或昇華人的欲望，以免物欲過盛破壞社會秩序，「閃爍着穿越古今的智慧」。

見物與見人

言及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於1949年後，飽受形形色色多為腹中空之打手批判與凌辱，友人TK即傳來朱先生作於1958年之舊文一篇：〈「見物不見人」的美學——再答洪毅然先生〉，並稱文章要旨，可於最後二百來字之結論中得之，亦足以闡挾所謂馬列「科學真理」旗號而妄議者也。

閱之，頗有同感；「洪先生引了許多詩句來說明他的論點。我也有詩為證，抄下來作為本文的總結：『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

聽？」（蘇東坡〈琴詩〉）說琴聲就在指頭上就是主觀唯心主義，也就是我過去的看法；說琴聲就在琴上，就是機械唯物主義，也就是蔡儀、李澤厚、洪毅然等人的看法。說要有琴聲，就既要有琴（客觀條件），又要有彈琴的手指（主觀條件），總而言之，要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這是蘇東坡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管這種看法叫什麼主義，聽深思的讀者們決定罷！」

亡友黃繼持論魯迅、陳映真與朱光潛，有謂「陳映真繼承魯迅以來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包括日治時期及光復初年的台灣新文學），文藝與人生血肉相關，文藝與國家前途結合在一起。文藝肩負啟蒙的任務：上下求索，自覺覺人。文藝兼及戰鬥的職能：吶喊、抗爭，指向社會政治行動。『文』跟『人』連在一起，『個人』又跟『國家』連在一起，總體上以社會實踐的要求貫徹終始……就文人寫作而言，『藝術性』之追求，只是整體實踐中的一個環節，從屬於意義更廣的人生國族目的之下。」

據此，古蒼梧認為：「但這個傳統有一個危機，即走向功利主義。文學一走向功利，便會只見目的，不見過程；只見事理，不見事實；只見群體，不見個人。這種走勢，正好與文藝的原理與要求背道而馳。他（指黃繼持）認為就『五四』以來的中國經驗看，不少作家都因此而未有充分發揮藝術上的潛力，連魯迅也不例外。」

「事實上，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已察覺到這種危機，只因他後來投日便沒有給予充分重視……周作人引魯迅的話，指出『革命文學』會變成『遵命文學』（〈文學革命運動〉），而『遵命文學』的害處是『在己者是做慣了之後頭腦就麻痺了，再不會想自己的意思，寫自己的文章。害處之在人者是壓

迫異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現』。這些情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迄『文革』的中國大陸文壇，有驚心動魄的發展，使稍有個性與才華的作家，不是封筆就是噤若寒蟬，甚至遭受迫害，已不是藝術潛力沒有充分發揮那麼簡單了！歷史的教訓是慘痛的……。」今之視昔，就中國大陸而言，能說此害完全摒除乎？

二〇〇九年八月

2003年古兆申和盧瑋鑾攝於訪談後。



訪談日期

第一天：2003年6月25日
第二天：2003年7月2日
第三天：2003年7月9日